



YUYAN RENLEI XUE

©纳日碧力戈／著

语言人类学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YUYAN RENLEI XUE

语言人类学

◎纳日碧力戈／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人类学/纳日碧力戈著.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 978 - 7 - 5628 - 2769 - 6

I. 语… II. 纳… III. 人类语言学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062 号

语言人类学

纳日碧力戈 著

责任编辑/严国珍

责任校对/金慧娟

封面设计/戚亮轩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话: (021)64250306(营销部)

传真: (021)64252707

网址: press.ecust.edu.cn

印 刷/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6.5

字 数/168 千字

版 次/2010 年10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10月第 1 次

印 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5628 - 2769 - 6/C · 141

定 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出版社营销部调换)



前言

语言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人类学，属于人类学分支。语言人类学从文化资源、社会实践、历史记忆、话语权力等四个方面研究语言和语言现象，紧扣文化、实践、历史、权力这四个主题。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处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问题，其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注意推陈出新；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人，是他们的历史和社会记忆；研究内容是现场话语和情感，是对话活动及其社会意义和社会分类。

语言是社会指号，是文化资源。它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语言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也是人类能动作用的一部分。博厄斯、萨丕尔、马林诺夫斯基及其他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高度重视语言对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格尔茨把文化看作是文本和意义之网。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这种开放的取向使我们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理论中广泛汲取营养，充实自己的研究，提高自己的水平。布尔迪厄的“社会习性”（又作“惯习”）概念和实践观





点,对语言人类学有特殊价值:语言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其本身是社会实践;语言习惯具有无意识的特点,是嵌入文化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习性,常常也是“无主体的”,而福柯在自己有关权力话语和生物力的论述中,也贯穿了“无主体”的观点。人在社会中虽然有自己的意愿,但他并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言行真正负责,有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在控制着历史结局和社会后果。实际上,这是一种合力,它不独属于任何某个因素。吉登斯指出,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于互动的再生产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他们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又再生产了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结构)。他指出,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既是话语实践的工具(媒介),也是结果(产品)。这就是结构双重性。

语言人类学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象征表现的政治性、权威的构成、权力的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文化根据、社会化过程、人(自我)的文化构建、情感的政治性、仪式表演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关系、选定范畴的知识与认知、艺术表演与审美政治、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都在语言人类学中得到全新研究。

美国哲学家、指号学家皮尔斯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分为征象、对象和释义三部分,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两分法。皮尔斯关于指号“三性”(或“三元”)的创见,雅各布森关于语言诗学的创见,都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

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要彻底理解人类社会,就要把它作为符号系统来



研究。克拉克洪在研究那伐鹤人的时候,先是关注社会制度,随后转到象征体系。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雅各布森的音位理论更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的各種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可以从具体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推导转换生成的形式。由于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本土人对这种结构的看法并不重要,而由具体的文化材料推演出的无意识结构是普世成立的通则。

直指(deixis)理论、语言行动理论和命题理论,为语言人类学开拓了无限空间,使它充满活力,主动和其他学科对话,取长补短,发展自己;而莫里斯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对于语言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受到人类学中意义研究者和语用研究者的欢迎。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研究意义首先要研究人的活动,即把语言作为活动,而非单纯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维高茨基也指出,人不仅思考,他还运动、建造、触摸,并通过身体活动和符号活动与其他人和物互动。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个活动既涉及语言,也涉及身体和身体的活动。意义产生于互动,就像跳舞,舞伴要相互配合,根据对方的动作随时调整。瓦雷拉等人指出,“环境”不是脱离神经系统的认知对象。神经系统为“环境”赋予当下的意义,当然,外在世界也参与了生物体之存在过程的建构。生物体和环境之间这种重复互动,就形成了耦合过程。苏联思想家巴赫金认为,意义离不开现存的社会关系,语言实践和文化实践创造意义,积累历史,是现存社会关系所继承的遗产。语言习惯就是在这样的



过程中形成,并在传承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创造意义。人类根据意义行动,意义来自以语言为媒体的互动;个人在言语活动中要考虑他人的态度和角色,既充当行动者,也充当他人眼中的对象。正如皮尔斯说:“人是符号。”

纳日碧力戈

2010年3月于复旦书馨公寓

内 容 提 要

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语言人类学理论的专著,在大量引入英美理论的同时,也介绍国内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导论为语言人类学定位,从形式、内容、意义、能动、历时等视角讨论作为指号系统的语言和语言现象。

第二章从普遍性和相对性着眼,讨论语言作为文化资源的功能,涉及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结构与认知、语言的文化隐喻、时间和空间等主题。

第三章介绍语言的由来,从进化论出发,讨论从猿到人的过渡对于人脑构造的重要影响,讨论人脑构造的革命性变化和分节语言产生的相关性。同时,对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异同进行比较。

第四章从社会实践的视角讨论语言和语言现象,引进生物学结构耦合概念,强调互动,突出说话即行动的说话民族志主题,对文化翻译实践作理论探讨。

第五章重点讨论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及其功能,内容涉及文字的认知作用,其不在场的信息传递功能,介绍汉字文化圈和书法的文化关联。

第六章是对语言人类学前沿理论的重点评介,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经巴赫金、维高茨基的对话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过渡到皮尔斯的指号三性(或称指号三元)。由雅各布森和西尔弗斯坦代表的“移动符”理论,仍然是语言人类学的前沿理论,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本章最后一节介绍和讨论认知语言学。

第七章展望语言人类学的现状与发展,讨论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全新背景下本学科的传统研究课题和新的发展方向。语言意识形态、种族主义对语言的嵌入、媒体化文化、话语交互性等,都是崭新的学科生长点。



目录

1	▶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定位
6		第二节 形式、内容与意义
8		第三节 语言：能动和历时的象征活动
10		第四节 语言：指号系统
16	▶	第二章 作为文化资源的语言：普遍性和相对性
16		第一节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26		第二节 结构与认知
64		第三节 语言的文化隐喻
70		第四节 时间和空间
85	▶	第三章 语言的由来
85		第一节 达尔文的进化论
87		第二节 从猿到人
89		第三节 人脑和语言
91		第四节 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
94	▶	第四章 语言和实践
94		第一节 结构耦合
104		第二节 说话民族志
124		第三节 语言和行动



128	第四节	文化的翻译活动
135	▶ 第五章	文字的力量
135	第一节	关于文字的起源
139	第二节	文字和语言
141	第三节	文字的作用
144	第四节	超越文本
146	第五节	汉字文化的影响
148	▶ 第六章	重归语言人类学
148	第一节	游戏与规则(维特根斯坦)
149	第二节	对话理论和社会行动理论 (巴赫金、维高茨基)
155	第三节	“指号三性”(皮尔斯)
159	第四节	“移动符”(雅各布森、西尔弗斯坦)
162	第五节	认知语言学
166	▶ 第七章	语言和全球化
166	第一节	数字化生存
169	第二节	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172	第三节	语言意识形态
177	第四节	现状与发展
181	参考文献	
197	后记	

·第一章 导 论·

语言人类学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语言的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语言的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语言的历史记忆、语言的话语权力。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动态指号系统,既可以是元语言(用来解释语言现象的语言工具和用来研究语言现象的语言),又可以是嵌入文化的隐喻手段,也可以是社会行动(指以言行事或“施为”,performativity)。人类语言的存在是一个与人类生息同步的过程,与社会和文化共生,并不断发展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意义,在历史长河中记忆文化。信息来自差异,从声音的抑扬顿挫,到外部环境、内部心理的发展变化,都是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变化,就没有差异;没有代谢,就没有信息。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语言行为反映文化阶层。

第一节 语言人类学定位

语言人类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处于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既可属于语言学,也可属于人类学,其定位取决于研究者或学者群,并无绝对界限。我们同意海姆斯的意见,把它归入人类学(Dell Hymes, 1963)。语言人类学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语言现象和语言实践。杜然提(Duranti)认为,区分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和人类





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有重写历史的风险 (Duranti, 1997: 1-2, footnote 1), 因为语言学和人类学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 人类学家要从语言尤其是语义分类系统入手研究对象社会; 而语言学家也往往扩展他们的研究范围, 或者把音位学结构理论运用到社会和文化分析中 (如列维-斯特劳), 或者利用文化事实诠释语言表述 (如柏林和凯研究的颜色词)。事实上, 许多研究者并不十分在乎学科名称, 用法比较随意。例如海姆斯在定义语言人类学的时候, 同时使用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 (Hymes, 1964, Introduction; Duranti, 1997: 1-2, footnote 1)。尽管如此, 经过一部分人类学者大半个世纪的努力, 语言人类学已经有了基本定位。首先, 语言人类学者是学科边缘人, 他们要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问题, 边缘即其特点; 其次, 他们的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 在继承旧学的基础上, 注重吸取现代社会思想的精华, 积极参与学术交流;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人, 是活动者, 是实践者, 是有历史记忆的人; 他们的研究内容是这个活动者和实践者的现场话语和情感, 是活动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分类。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是社会能动者言行合一、参与社会建构的持续过程, 研究的是这个过程中的互动、发展和变化。

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也有难解之缘。按照福利 (Foley) 的看法, 人类语言学属于语言学的分支, 主要从人类学观点看语言, 发现语言使用、风格、形式和语域后面的意义; 社会语言学把语言看作社会习惯, 围绕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变量来观察社会群体的语言行为模式及其差异 (福利, 1997: 3)。其实, 无论从社会思想的渊源, 还是从具体方法论的运用看, 人类学与社会学多有交叉。马克思、涂尔干 (又译迪尔凯姆, E. Durkheim)、帕森斯、福柯、布尔迪厄 (P. Bourdieu)、列维-斯特劳 (Levi-Strauss) 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已经渗透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像年龄、性别、阶级、种族



等概念,这两个学科也都在使用。从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层面说,拉伯夫(W. Labov)的社会语言学理论(1966,1970,1972a,1972b,1984)对语言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福利和杜然提都大量引述了他的观点。由此看来,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少数民族的迁移和都市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反思,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使它们走到了一起。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看作是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它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反映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人类学所研究的语言是社会构造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能动作用的一部分。博厄斯(F. Boas)、萨丕尔(E. Sapir)、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及其他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语言对于社会的解释和表征作用。格尔茨把文化看作是文本和意义之网(格尔茨,2000)。

语言人类学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来研究,这本身具有独特、深远的意义。这种开放的取向使我们能够从现代哲学观点和社会理论中广泛汲取营养,既尊重了他人的劳动,也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又称“社会习性”)概念和实践观点,对语言人类学有特殊价值:语言是社会习惯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社会实践;语言习惯具有无意识的特点,是嵌入文化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习性,也常常是“无主体的”。福柯在自己有关权力话语和生物力的论述中,也贯穿了“无主体”的观点(H. Dreyfus and P. Rabinow,1983)。人在社会中虽然有自己的意愿,但他并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言行真正负责,有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在控制着历史结局和社会后果,产生不确定性。实际上,这样一种力量就是“合力”,它不独属于任何某个因素。这涉及吉登斯(A. Giddens)讨论的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他看来,社会能动者和社会结构处于互动的再生产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



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他们在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又生产了这些社会组织资源(结构)。吉登斯指出,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它既是话语实践的工具(媒介),也是结果(产品)。这就是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A. Giddens, 1979, 1984)。

海姆斯在 1964 年编辑出版了《文化和社会中的语言——语言学和人类学读本》(Hymes, 1964),收录莫斯(Marcel Mauss)、梅耶(Antoine Meillet)、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布朗(Roger Brown)、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人的著述,而这些作者自己不一定承认是语言人类学者,但这个读本的面世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确定了语言对于理解文化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它确定了文化和社会对于理解语言的相关性(Duranti, 2001: 1-2)。

语言人类学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如通过象征来表现的政治权威构成、权力合法化、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文化根据、社会化过程、人(自我)的文化构建、情感的政治性、仪式表演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关系、范畴知识与认知、艺术表演与审美政治、文化接触与社会变迁等,都在语言人类学中得到新的研究(杜然提, 1997: 3-4)。

美国哲学家和指号学家皮尔斯(C. Peirce)和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 Jakobson)都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指号(sign)分为征象(sign)、对象(object)和释义(interpretant)三部分,超越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两分法(“能指”signifier, “所指”signified)。皮尔斯关于指号“三性”(thirdness)的创见,雅各布森关于语言诗学的创见,都是语言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根据。

人类学领域一直存在对心理和认知的研究意识和取向,只是各家在处理心理、认知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看法不同,甚至有时大相径庭。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要彻底理解人类社会,就要把它作为符号系统来研究(Beattie, 1955: 1-14)。克拉克洪在研究那伐鹤人的时候,先是关注社会制度,随后转向它的象征体系(R. D'Andrade,



1995: 12-13)。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和认知人类学深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雅各布森的音位理论更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和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转换生成由具体文化的二元对立推导出抽象形式。由于文化材料的结构是无意识的产物,本土人对这种结构的看法并不重要,而由具体的文化材料推演出的无意识结构是普世成立的通则。早期的认知人类学与语言学、生物学有不解之缘,它既用语言学的成分分析法研究亲属称谓,也用生物学的分类方法研究具体社区中的分类体系。后来,认知人类学引进心理学的范畴理论,研究范畴和记忆及推理的关系,进而又涉足人工智能的研究。如果说象征人类学代表了“由外向里”的观点,那么,认知人类学代表了“由里向外”的观点。前者不大注意个体和生理,后者常常忽视社会性。

如果说语言研究曾经忽视意义研究的话,那么,现在经过马林诺夫斯基、雅各布森、拉可夫、西尔弗斯坦等人的努力,至少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语言研究和意义研究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直指(deixis)理论(Jakobson, 1957; Fillmore, 1971a; Silverstein, 1976)和语言行动理论(Ross, 1970; Sadock, 1974; Searle, 1970)以及命题理论(Lakoff, 1971; Fillmore, 1971b),为语言人类学开拓了无限空间,使它充满活力,主动和其他学科对话,取长补短,发展自己。莫里斯句法—语义—语用三分法,对于语言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Morris, 1946),受到人类学中意义研究者(Goodenough, 1956; Lounsbury, 1956)和语用研究者(Hymes, 1962)的欢迎。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句法、语义和语用之间的传统藩篱在生成语义学和言语行动理论中不复存在:语义是语法结构的基础,对指号的运用产生了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或者说,指号系统和指号意义来自对指号的运用,是后者的功能(S. Bean, 1978, Introduction)。



第二节 形式、内容与意义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是围绕形式、内容与意义来进行的,要掌握语言人类学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弄清楚有关讨论的脉络,否则就不能和国内外同行进行有效的交流,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在社会人文学科中,形式、内容与意义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问题。西方哲学以二元对立为基础,一直在讨论精神与物质、经验论与唯理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是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尤其强调感觉经验,否认或者贬低先天观念、先天范畴和先天知识。唯理论坚决反对经验论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的原则,认为必然、普遍、可靠的知识不能来自经验,只能来自先天的自明之理。康德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强调互动、辩证和能动,对后来的社会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近代的传统哲学思想一直在寻找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寻找永恒的人性,寻找超越人类的进化图式。然而,在 18 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哲学唯心论重新抬头,似乎社会不再受永恒法则的支配,而要听命于社会能动者的主观活动。有趣的是,人类学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J. Dolgin et al., 1977:7)。

涂尔干虽然致力于实证研究,强调参与观察社会分工和自杀之类的社会现象,但他的最终追求是一种稳定的形式或者结构,即决定社会团结或社会问题的条件,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笛卡儿、霍布斯到穆勒、康德,都在心目中有一个新古典观念的社会模型,它要服从自然法则,要遵循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走向外在、先定的目标。他们这些思想家都认为社会生活的根基是和谐一致的。不过,正是康德本人把各种哲学问题归结为符号形式的问题,他也意识到理性的非理智基础(J. Dolgin et al., 1977:11)。康德《纯粹理性批



判》一书提出了符号形式的理论,讨论了符号形式与思维的关系。许多有名的社会科学家,包括涂尔干、韦伯、莫斯、冯特、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和皮尔斯,后来都围绕着康德提出的问题著书立说,沿着形式、内容与意义的探索之路走了下来。康德认为,思维的基本结构与思维的内容无必然联系,例如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属性就独立于我们看到的某个具体事物,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如俗语说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说,事物的这种时空和因果属性是独立形式,和人们所感知的具体事物没有依赖关系。涂尔干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解释不了社会形态的本质。社会形态的本质要在抽象结构中寻找(J. Dolgin et al., 1977:14)。韦伯和弗洛伊德在强调社会互动的同时,也都把形式和内容严格区分开来,仍然继承了康德的二分观。韦伯从思维活动中提取“理想型”,弗洛伊德主要寻找思维的基本结构。他们在强调社会互动的同时,继续区分形式与内容,突出形式的决定意义。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相当于抽象形式、价值体系;言语相当于内容,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项。也有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把这种形式看作是“社会语法”,似乎社会语法是稳定的,而具体的语言活动是多变的,同样也是形式超越内容、高于内容、独立于内容的观点。此外,康德、涂尔干和韦伯把意义作为混乱的对立面,认为社会稳定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混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诚心希望人类能够找到意义,克服混乱,拯救社会。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否认意义的对立面是混乱,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混乱。意义来源于行动,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劳动。他们都认为意义是社会行动者创造出来的,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形式和内容经常出现对转的情况,形式变成内容,内容变成形式,就像我们用语言(元语言)研究语言、用工具制造工具一样。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对转不可能是平面的、共时的;它是历史的、差异的、文化的和能动的。